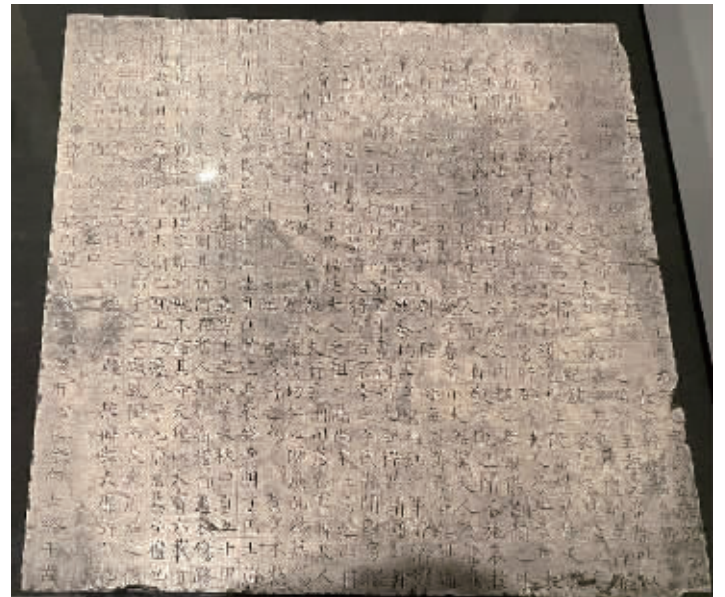


# 颜筋柳骨,贞石千秋

□徐兴无



2022年建成开放的陕西考古博物馆



陕西考古博物馆展出王珣撰,颜真卿书《罗婉顺墓志》出土志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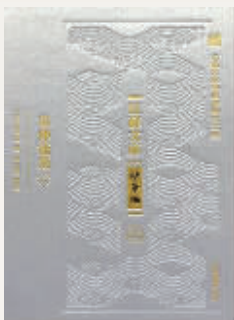
徐兴无  
书 | 话 | 文 | 脉

导读

出土的贞石,是历史的记忆,也是文学艺术的杰作。上面镌刻的“颜筋柳骨”,面目如新,带我们回到伟大的唐朝。



清嘉庆张海鹏辑刊学津讨源本《法书要录》所收张怀瓘《书断》书影



《范仲淹集》  
[宋]范仲淹撰  
薛正兴点校  
凤凰出版社



《艺苑卮言》  
[明]王世贞撰  
凤凰出版社



扫码关注  
江苏文脉公众号



今夏初伏将尽,有幸受邀去西安参加西北大学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同召开的“考古新发现与唐代文化研究的新议题学术研讨会”。西安已持续炎热多时,但一睹出土文物令人心神快慰,特别是两块唐代大书家写的墓志。

会议先安排大家参观刚刚建成的陕西考古博物馆,目不暇接之际,看见展柜中陈列的王珣撰于唐玄宗天宝六载(747),颜真卿(709-784,字清臣,琅琊临沂人)书写的《罗婉顺墓志》,2020年出土于咸阳渭城区龚东村唐元大谦、罗婉顺夫妇墓中。其时颜鲁公三十八岁,刚刚升任长安县尉,书风秀美婉柔,颜体特有的用笔法度尚未形成。

接着又去陕西考古研究院的一处工作站观摩柳公权(778-865,字悬诚,京兆华原人)撰并书写的《严公颙(ku à ng)墓志》,2022年出土于长安区市政道路建设工地。唐宣宗大中三年(849),身居河东郡公的柳公权为堂妹夫写墓志时已经七十一岁,书法的用笔结体均较其传世丰碑雍容疏阔了一些。志石已经墨拓,笔锋更加清晰,细观石面刻凿,虽偶有刻破笔划,或磨去重刻之处,但一千七百六十八字的柳体小楷挺秀铺陈,如庖丁之刃,新发于硎,光彩夺目。

世存颜、柳所书志石不止二种,但唯此两石是经由科学考古发掘的文物,更具研究价值。唐代是中国楷书成熟的时代,自“虞欧褚薛”始开面目,继之以“颜柳”成就典范。唐代书学理论家、扬州海陵人(今江苏泰州)张怀瓘在《书断》中已经品评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薛稷诸家书法。《书断》作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扬州,文末自云“开元甲子岁,广陵卧疾,始焉草创”,唐李肇《国史补》亦云:“开元中张怀瓘作《书断》。”传世版本数种,以收入晚唐张彦远(字爱宾,蒲州猗氏人)所编《法书要录》者为早。后人称赞颜真卿、柳公权的书风为“颜筋柳骨”,至以“颜柳”并称,皆出自宋人对石延年(曼卿)书法的评价。

范仲淹(989-1052,字希文,苏州吴县人)《祭石学士文》曰:“曼卿之笔,颜精(筋)柳骨,散落人间,宝为神物。”(《范仲淹集》卷十)

欧阳修(1007-1072,字永叔,江西庐陵人)《六一诗话》继之曰:“(曼卿)工于书,笔画遒劲,体兼颜柳,为世所好。”

中国传统书学多为譬喻式的艺术批评。形容书法多以人体筋骨为喻。刘熙载(1813-1881,字伯简,号融斋,江苏兴化人)《艺概·书概》曰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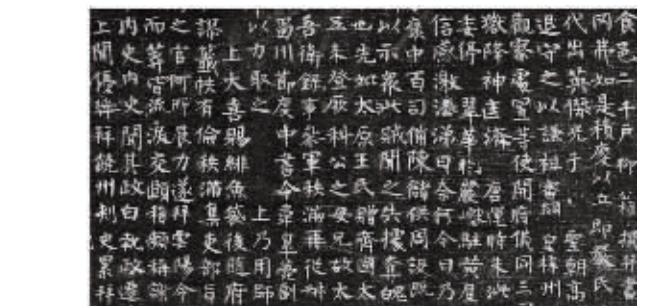
卫瓘善草书,时人谓“瓘得伯英之筋”,犹未得骨;卫夫人《笔阵图》乃始以“多骨丰筋”并言之。至范文正《祭石曼卿文》有“颜筋柳骨”之语,而筋骨之辨愈明矣。

“瓘得伯英(汉末书家张芝)筋,

家靖得伯英肉”的评语,见于《晋书·卫瓘传》。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的《笔阵图》形容用笔之法曰:“善笔者多骨,不善笔者多肉。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,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。”主张“多骨微肉”的“筋书”。唐代美术和诗歌多图咏骏马,因而张怀瓘的《评书药石论》又以马体为喻:“夫马筋多肉为上,肉多筋少为下,书亦如之……若筋骨不任其脂,在人为肉疾,在书为墨猪。”总之,筋骨二字形容的是书法创作中运笔的力量(笔力)与字体的结构(结体)。所谓的“筋”指运笔的弹性与结体的舒张,“骨”指运笔的端正与结体的紧凑。“颜筋柳骨”呈现出的“筋骨”风貌,正如明代文学家王世贞(1526-1590,字元美,苏州太仓人)《艺苑卮言》所言:“颜书贵端,骨露筋藏;柳书贵道,筋骨尽露。”颜字的结体,横笔细竖笔粗,起收提顿夸张,撇捺勾挑出锋尖锐,故多浑厚劲健之感;柳字的结体,笔划多拓展伸张,撇捺勾挑出锋果断,故多骨硬刚直之姿。

不过,后世对颜柳楷法不乏非议。比如北宋书法家米芾(1051-1107,字元章,湖北襄阳人)《跋颜真卿书》曰:“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,自以挑踢名家,作用太多,无平淡天成之趣……大抵颜柳挑踢,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,从此古法荡无遗矣。”南宋词人姜夔(1155-1221,字尧章,江西鄱阳人)《续书谱》曰:“矧(sh è n)欧虞颜柳,前后相望,故唐人下笔,应规入矩,无复魏晋飘逸之气。”这是以钟繇、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帖札书法标准,批评颜柳用笔勾挑出锋是刻意的装饰,而唐楷结体工整,缺失了天真自然的趣味和气韵。清代碑派书学贬低帖札,但同样认为唐楷的工整规矩尽失古人意味和风格。康有为(1858-1927,广东南海人)《广艺舟双楫》至谓:“不复能变,专讲结构,几若算子。截鹤续凫,整齐过甚。欧、虞、褚、薛,笔法虽未全亡,然淳淳散朴,古意已漓,而颜、柳迭奏,渐灭尽矣。”

唐人追求字体的规范应该有着更为远大的文化目标。姜夔《续书谱》指出了唐楷工整化的原因:“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,而士大夫书,类有科举习气。颜鲁公作《干禄字书》,是其证也。”祝嘉先生(1899-1995,海南文昌人,中年定居苏州)《书学论集·谈唐碑》认为唐楷与科举关系密切:“自唐代起,应科举考试的,都要‘削足适履’,力求匀整,而唐以后人,则不得不学唐碑,六朝碑是不合科举的尺度的。”科举乃至官方文字不仅要求书写工整,而且要求书写正体,排斥俗字。南北朝政治与文化的长期分裂使得文字的书写杂乱不一,这在南北朝碑刻之中比比皆是。唐继隋代一统之后,思想上以统一南北经学为要务,统一后的官方《五经》文本就是官方正字的标准。唐初于



《严公颙墓志》拓片局部

国学置书学博士,传习汉代石经、《说文》的文字,以《五经》文字作为标准字体。颜氏家族中,先有颜师古(581-645,名籀)于贞观年间奉诏刊正经籍,书写校雠文字的规范楷式,人称“颜氏字样”。唐玄宗时,颜师古的重孙颜元孙(?-732,字季修)继承祖业,作《干禄字书》,方便士子区分正俗字体,其《序》曰:“所谓正者,并有凭据,可以施诸著述、文章、对策、碑碣,将为允当。进士考试,理宜必遵正体;明经对策,贵合经注本文。”颜真卿是颜元孙的侄孙,曾书写《干禄字书》,刻于代宗大历九年(774),说明他对字体的正俗与规范有着自觉的意识。刻石虽佚,但摹刻拓本流传于后世。就在柳公权出生的前两年,唐代宗大历十一年(776),国子监司业张参又上《五经文字》,书于国子监讨论堂东西两壁。颜真卿、柳宗元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唐楷的,他们的书法不仅作为书法艺术的典范,而且作为通行正体字的典范为人们认同、欣赏,方便人们的学习与运用,也为后世的印刷字体提供了范式。因此,以颜柳为代表的唐代楷书对统一、规范唐宋以后历代的书写、书籍刊刻等文化事业有着重大的价值,不能仅仅从艺术史的视野加以论衡。

其实就书法艺术而言,唐楷也达到了时代的巅峰。胡小石先生(1888-1962,字光炜,生于江苏南京)虽是碑学书家,但他在《中国书学史》(1934)中将唐楷与唐代文学相较,特别赞赏其中的变革创新精神。在他看来,文学自陈子昂出,变革六朝文学,复兴了建安风骨;书法自颜鲁公出,变革二王书风,复兴了北碑风范。正是通过创新变革,唐楷呈现出更为壮阔的文化气象:

唐代文学波腾,为中华文化之极盛,上可与汉并称雄。汉之分隶,唐之今隶(即楷书),足以代表二朝之磅礴精神。

当然,除了书法的价值之外,墓志的史料价值更为学界关注。吴讷(1372-1457,字敏德,苏州常熟人)

《文章辨体序说》曰:“墓志,则直述文章、岁月、名字、爵里。”“志铭埋于扩者,文则严谨。其书法,惟书其学行大节,小善寸长,则皆弗录。”过去,我们在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《柳河东集》里见过《送严公颙下第归兴元观省诗序》,鼓励这位落第的士子秉承家风,不必自薄。而墓志的出土,又让我们知道严公颙与另一位河东柳氏名人的亲密关系,而且掌握了这位《全唐诗》中仅收一首《题汉州西湖》的作者的家族世系、生卒年月与仕宦经历。他的父亲严震是山南西道节度使,朱泚发“泾原兵变”,唐德宗出逃,严震派兵保护唐德宗进入梁州,直至长安收复。新、旧《唐书》均有传。所以这方墓志为唐代历史、文化和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档案。柳公权也很会写文章,他选择了两件感人的事,再现了严公颙人性的光辉,表彰他的“学行大节”。一是严公颙任云阳县令时,很多穷人葬不起死去的亲人,就埋在家里。他召集这些人,给他们讲《孝经》最后一章《丧亲章》,让他们明白尽力葬亲的道理。大家听了“流泪交頔,稽颡(q i s à ng)称谢而去。”二是到庐陵任刺史时,发现度支税收中有逼迫百姓交纳一种叫纒的绢绵项目,百姓只能花很多钱买纒交纳,有因此破产逃亡的。严公颙上书朝廷要求赦免,“逋亡者尽归”。而此时当地出现了白雀、嘉莲等祥瑞。按照唐代的制度,应该上奏朝廷。《唐六典》规定:“凡祥瑞应见,皆辨其物名。上瑞、中瑞、下瑞,皆有等差。若大瑞,随即表奏,文武百僚诣阙奉贺。其它并年终员外郎具表以闻,有司告庙,百僚诣阙奉贺。”但严公颙“并不进献”,他一定是认识到大唐的太平盛世不再,上天已无祥瑞感应了。

《墓志》的铭文之末,柳公权写道:“录之贞石,千秋不磷。”他用了《论语》“不曰坚乎,磨而不磷”的典故,祝愿严公颙的事迹永垂不朽,而墓志的出土,也是“颜筋柳骨”的书法和唐代文化精神永不磨灭的实证。